



南京叙事 现状

“没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
是南京人太低调，还是南京作家不会讲故事

王谢堂前 尴尬的“南京叙事”

□快报记者 陈曦

金陵王气与惨淡背影

自古以来，绝大多数关于南京的描述都是在怀旧访古，充满了伤感气息。

叶兆言在《江苏读本》里写道：“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浏览南京的历史文献，我们所能看到的，似乎总是一个繁华都市的惨淡背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了歌咏这个城市的基调。这显然和南京的特殊历史分不开。”

历史上的南京曾有过一大堆名字，金陵、石城、秣陵、建邺、建康、江宁、白下、蒋州、集庆、应天、上元、天京。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堆故事。名字被改来改去，一定有它的道理。能够为一个城市命名的人，自然应该是征服者，有人在这里登基做了皇帝，有人在这里亡国丢了天下，既然是改朝换代，那就先把名字改了吧。

所以，金陵王气也一直遭到大家的质疑。南京在历史上有过无数次保卫战，几乎没有一场以胜利告终。在这里住过六七年的唐诗人李商隐，为此大发感叹：“三百年来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自从东吴的最后一位皇帝孙皓“一片降幡出石头”之后，一个接一个的亡国皇帝就再也没有间断过。别处也有亡国皇帝，可是说起名气，谁也不能与南京的这几位相比。譬如搂着妃子一起跳井的陈后主，譬如能写一手好诗词的李后主。没有一个古老城市能像南京这样拥有那么多可以让人津津乐道的亡国故事。相比“金陵王气”，亡国之音更像是响彻在这个城市上空的主旋律。

这样一个惨淡伤感的城市形象，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合时宜。

2010年10月，80集电视文化系列片《重读南京》推出，深入解读文化南京的城市属性，试图颠覆长期以来一直缠绕在南京头上的“短命王朝、偏安朝廷、悲情城市、伤感之地”的城市定位，旨在重塑南京“文化名城、佛教之都、英雄之城、胜利之都”的城市形象。

本土作家薛冰站在一个老南京的角度，认为南京这座城市的必要重读，因为它被人们长期误读或错读。“一直说南京是个伤感的城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六朝时，朝代更迭比较多，唐宋人到此凭吊古迹，写得比较哀伤，在这个情况下，后人读他们的作品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但这是不全面的。你要说短命，三国中建国时间最长的就是吴国。南北朝时，南方是宋齐梁陈，北方是五胡十

六国，哪个更短命呢？东晋到南朝的皇帝都是前朝的大臣，同样的国家，同样的都城，同样的皇宫，只是换了一个人做皇帝而已。从东晋到南朝宋，看做一个大朝代的话，有两百多年，算不上短命。南唐的时候，北方是五代十国，每个朝代也都很短，南唐在十国中的寿命排第二，也不能说短命。”

被低估的六朝

作为首都，南京真正能对全国发号施令的，似乎也只有在明朝初年，以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那几年。更多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只有半壁江山，要不就是流亡政府的所在地。相对于中原王朝，所谓金陵王气，其实就是觊觎天下，堂而皇之地想搞分裂。对于历来推崇大一统的中国人来说，南京作为这些朝廷的都城自然也受到牵连。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章灿认为，如果非要给南京的文化争个地位的话，那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理由的，因为乱世中的文化，特别是六朝文化，一直存在被低估的现象。

“六朝文化是南京文化的一个代表，它在时间上最长，但是它的前面是汉代，后面是唐代，处在这两个大一统的盛世之间，六朝是一个分裂王朝，从国力、军事的角度，它被看做是一个衰世，这是后代人对六朝的一个定义。这也形成了一个主流、正统的话语。比如苏东坡赞扬韩愈的时候，就说他‘文起八代之衰’，意思是说在汉代到唐代的这段时间，文化衰落下去了，从韩愈开始才让这个衰势止跌回升。这当然抬升了韩愈的地位，却从文化的角度把六朝打压下去了。南京跟六朝联系在一起，往往给人一个印象：衰世和乱世，走马灯似的换皇帝。后代替前代修史，对六朝也有相当程度的抹黑。但是，六朝的文化除了衰乱，还有非常自由开放的一面。

北方文化南下，佛教进入中国，六朝在融合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六朝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唐朝的文化那么昌盛，也是因为六朝替它打下了基础。但是大家往往会把这个过程跳过去，直接看到唐代兴盛的结果。唐宋之间有个南唐，南唐在当时那些分裂的小国当中，经济发展算是不错的，文化艺术上也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北宋统一之后，南唐的文人、画家在北宋朝廷中，成为一支十分重要的主力。南宋有很多人包括陆游都希望定都建康，但由于安全考虑最终选择了杭州，陆游那些人的愿望没有达成，就经常到南京来寻访遗迹，所以一提到南京，也跟唐朝人差不多，有很多

“一直说南京是个伤感的城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要说短命，三国中建国时间最长的就是吴国。从东晋到南朝宋，看做一个大朝代的话，有两百多年，算不上短命。南唐在十国中的寿命排第二，也不能说短命。”

——薛冰

“当它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不像北京那么嘈杂，又不像上海那么势利，少一些权和利的诱惑，这对于建设文化还是有优势的。”

——程章灿

“南京是个十分宽容的城市。南京人不在乎别人在自己的地头上横行撒野，南京人对外地人甚至充满欣赏。宽容对创作的好处显而易见，宽容是对文学事业的最大扶持，宽容是文学的根本。”

——叶兆言



鸡鸣寺总让人想起佛教
昌盛的南朝

怀古的作品。再说明朝，南京昙花一现地做过几十年首都，后来朱棣迁都走了。明初的一些文人对南京的描写也很恢弘，很有气势，很有王气，很有政治前景的样子，首都迁走以后，就不适宜也没人敢再这么写了。”

巨大的“南京叙事”

伴随南京不断更迭的历史的，是一个巨大的书写传统。南京像个老古董被后来者们反复摩挲，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意象。

早在东晋左思《三都赋》中的《吴都赋》就描写了三国时代南京（建业）的风貌，一时“洛阳纸贵”。庾信有名的《哀江南赋》则写于“大盗移国，金陵瓦解”的侯景之乱后。明清以来孔尚任的《桃花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以南京做背景。而又有什么作品能够超越《红楼梦》对南京金陵的追怀？

一九二三年代朱自清、俞平伯夜游秦淮河，各写下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开启现代文学的南京想象。一九三二年鲁迅回到曾经求学的旧地南京，作了“六代绮罗成归梦，石头城上月如钩”的叹息。到了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顾盼之际，道尽历史天翻地覆的感怀。一九五〇年，远走美国的张爱玲改写了《十八春》，烟水茫茫的玄武湖，清凉山上荒凉残破的石阶，莴苣圆子和素烧鹅，木讷被动的南京人……

当代的作家书写南京最富盛名的首推叶兆言。他的《夜泊秦淮》遥想民国风月，戏拟鸳鸯说部，很能托出南京那股新旧时间错置的暧昧感触。其他如稍早的朱文（《我爱美元》）和当红的毕飞宇（《推拿》）则写下当代南京的平民风情。至于苏童虽然不以南京为小说题材，作家本人却在南京定居多年，耳濡目染，已经成为南京书写的另一种代言人了。

薛冰说，“六朝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明朝要亡了，金陵王气成为汉文化的支撑点，大批的汉族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做过前朝都城的南京，中原文化人也纷纷跑到南京来，这里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中心。民国，这里又是都城。这种情况下，南京的文化怎么可能不辉煌呢？”

但跟过去相比，南京的文化魅力似乎正在减退，南京的身影开始淹没于一众二线城市当中。近年来，无论官方，抑或民间，总看不到什么关于南京的大手笔。关于南京风土人情的电视剧还只是上世纪80年代拍过的一部《秦淮人家》。电影《庐山恋2010》在

十里秦淮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意象

南京取景拍摄，政府也急切地试图在其中表达南京元素，但并未引起太大反响。

对此，薛冰不以为然。“江苏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南京，江苏文学界在全国处于高原的状态，江苏作家非常多，水平都很高，所以显不出一个特别冒尖的，不像别的省份，陕西的贾平凹到南京来可能就冒不出来了，而南京苏童、叶兆言、毕飞宇他们任何一个拿到别的省就冒尖了。贾平凹的全集现在卖三千块一套，南京人也不爱显摆，不喜欢炒作这些。我想我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是认同的。如果觉得现在没有以前那么辉煌，那也不是南京一个城市的问题。话说回来，现在别的地方又拍过什么好电影呢？”

“落后自有落后的好处”

无论是程章灿这个外地人，还是叶兆言、薛冰这两个本地人，他们都认为，包容是南京这个城市的最大特点，正是这种包容成就了南京的文化地位。

程章灿说，即使在今天，南京的影响力还是能够辐射到周边一些省份，浙江、河南、江西、福建、安徽等等。“当它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不像北京那么嘈杂，又不像上海那么势利，少一些权和利的诱惑，这对建设文化还是有优势的。”

“南京这个地方，本土作家少，辉煌的都是外地人。你看毕飞宇老写他那个苏北的小村子，苏童则是苏南的小村子，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现在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

桐城派姚鼐、方苞是安徽人，袁枚、李渔是浙江人。南京文化的这种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例，外人特别容易在这里扎根。这种状况也就造成了南京文化多元、多中心、多层次的特点，不像有的城市文化比较纯粹。”薛冰说。

叶兆言觉得，“我过去的观点，认为南京文学的繁荣兴旺，是因为此地的稍稍落后。我的意思是指说，和大上海大北京相比，南京人当不了官，挣不着钱，于是就无可奈何地写小说，就当了作家。现在想想，这个观点是想当然。其实，在庞大的南京作家队伍中，真正地道的南京本地人并不多。南京是个十分宽容的城市，这个城市一向是不排外，不仅不排外，而且喜欢把这个城市的领导权心甘情愿地交给别人。南京人不在乎别人在自己的地头上横行撒野，南京人对外地人甚至充满欣赏。宽容对创作的好处显而易见，宽容是对文学事业的最大扶持，宽容是文学的根本。”

文学这棵树有时候并不在乎什么特殊的养料，有时候，只要有那点自由清新的空气，有点阳光和雨露，就可以根深叶茂地自然生长。”